

读懂记者会上的经济风向转变

李锦

在中国新一届政府还没有出台经济政策的时刻，新总理的第一次记者会自然备受外界关注。人们不光要看他说了什么，更重要的是看他没说什么。

新总理有两个没有说。一个是投资拉动，一个是政治改革。

一个是没有说政治改革。从议程看，李总理在全国人大会议闭幕时阐述的议程，焦点基本上落在经济和社会的范畴内。一年前温家宝在全国人大年度会议结束时表示，没有政治体制改革，中国可能丧失近年取得的经济改革成果，其犹在耳。

一个是没有说投资拉动。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刺激政策将不再继续。用财政主导的大投资来保增长显然已经不是总理的主题，甚至连稳增长也没有强调。

再看，总理说了什么。他没有强调政府要做什么，他阐述了自己的愿景：缩小政府规模、加大反腐力度以及更加公平地分配财富，在整个记者会上28次使用“改革”这个词。明确本届政府改革的核心就是简政放权。针对政府管得太多的抱怨，他誓言将国务院各部门行政审批事项再削减1/3。这都是讲得改革，触及政企分开这个改革的核心问题。

显然，中国经济不能不增长，然而，如何发展和增长？如果没有财政主导的大投资，没有宽松货币和高流动性，怎么办？李强的答案是，“推动经济转型，把改革的红利、内需的潜力、创新的活力叠加起来，形成新动力，并且使质量和效益、就业和收入、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有新提升，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同时，推动民营资本顺利有效地进入金融、能源、铁路等领域，还要推进社会领域的相关改革，促进社会的纵向流动。总之，一句话，通过改革和制度升级来实现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

给人感觉，李总理为经济的可持续和长期发展创造坚实的基础，使经济发展不再依赖政府持续的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并逐步解除国有部门对经济的窒息性的主宰。新政府应该采取措施为经济引入更多竞争。增强竞争性可以为中国带来的潜在好处是巨大的，这也为别国的历史所证明。只需看看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美国和欧洲，就可看到竞争增强的巨大经济和社会影响扩大了消费者的选择面，降低了价格并带来了更快的经济增长。一个

投入竞争性市场的国有企业，会比一个主导着有限市场的国企获得更多收益。因为一个竞争激烈的市场，会比只由几个垄断企业控制的市场发展地更快。价格下降、持续的产品质量提升和良好的营销都会吸引人们做出更多消费。这有利于成功的企业从竞争中脱颖而出。消费者储蓄率的不断下降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长期基石。更激烈的竞争还可以促进产品创新，而这也恰好符合中国政府政策的一项重要的长期目标。

我们由此可以分析，中国经济的发展风向标已经发生改变。自从2008年金融危机四年多以来，刺激保增长一直是中国经济宏观政策的主旋律，泡沫越来越大，热钱越来越多，危机要素的积聚也越严重。面临的进退维谷的两难处境已经告诉我们，救市政策只是紧急状态之下的不得已之选，其严重的后遗症表明它无法支撑未来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尽管人们在呐喊式地提建议，然而投资刺激经济发展的惯性总是刹不住车。

现在，改变的时刻已经到来，中国经济必须重回市场的轨道。这次记者招待会上，新总理的基调改变使人看到这种风向转变。

李克强总理在记者会上透露，1—2月份，中央财政收入增幅只有1.6%，可以推想，未来财政收入再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不大可能了。

我们可以回顾这四年的风向转变。为了应对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本来以调结构为主基调的中国经济突然转向了强制式的萧条经济学。政府财政主导下的一场气势恢宏的基础

设施建设拉开帷幕，以此来抵消外需的崩塌。银行的货币闸门大开，货币供应一时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峰，一个月贷款达到1.79万亿，随之而来是房地产迅速实现V型反转，房价和各种资产价格再次一飞冲天。这都是从2008年11月后发生的事情。

在这种风向转变中，受灾面最大的是中小企业。中小企业、民营企业从此陷入严重的生存困境。其中的直接原因与刺激政策有关。这种刺激的资金进入大企业与政府部门，刺激政策带来了资产价格的暴涨，地产和各种生活成本的飞涨倒逼着工资上涨，工业成本越来越高，利润越来越薄，出口企业逐渐丧失了价格竞争力。

中央财政的收入一直都有稳定的保障，因为其主力财源主要来自能源、资源、金融、交通、地产等领域，这些中央的财源占有上游的垄断地位，他们可以向下游的中小民营企业转嫁成本，以维持高利润。

中小企业成为直接的受害者。小企业不堪重负，出现成批倒闭现象。虚拟经济发达，实体经济萎缩。1、2月份中央财政面临增长的拐点，正是说明这条路已经走到了尽头。这个拐点迟早会来到的。

如果新领导层以提升各个经济部门的竞争作为改革出发点，消费者能立竿见影地从中获益，而这又将让普通民众对政府的改革计划感到信任和支持。

强有力的公众信任是改革进程长期持续的关键，所以从一开始就争取尽可能多的公众支持非常重要。尤其应该得到中小企业的支持。

（作者系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



来论

警惕“经营自主权”异化为涨价特权

张玉胜

近日，交通运输部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何建中表示，国家铁路局“三定”方案将很快公布，铁路票价应由有关部门加强监督，但作为铁路总公司，企业应有相对的经营自主权。（3月22日《新京报》）

伴随着铁路总公司的挂牌成立，铁路运输管理由“铁老大”转为市场化的改革大幕就此拉开。交通运输部发言人对于铁路票价“企业应该有相对的经营自主权”的表态，引发社会热议。尽管发言人在“自主权”前面附

有“部门监督”和“相对”字样，但无法阻止人们产生“自主权”即“特权”、“市场化”即“涨价”的担忧性解读。

诚然，政企分开之后的中国铁路

总公司已属自负盈亏的企业性质，其拥有根据供需变化实施价格调节的权利当无可厚非。但问题是，时下的铁路经营仍属无充分竞争的垄断格局，再加上其承受的超万亿债务压力，中国铁路总公司手中的定价“自主权”会如何使用？尤其是，透过中国工程院院士、中铁隧道集团副总工程师王梦恕“火车票今后会像中石化、中石油一样，按照市场规律，该提价

就提价、该降价降价”的解读，人们似乎已看到了未来火车票价格浮动的路线图——“涨多跌少”；涨价时就是

“与国际接轨”、人降我不降时就强调“中国国情”——人们对“两桶油”的

价格形成机制的深刻诟病，会不会在

政企分开的“铁老大”身上重蹈覆辙？

尽管将铁路运营推向市场和实

施专业化运作，契合了社会发展的大

势所趋民心所向，但铁路运输作为

公共交通工具的公益属性并未改变。

如何处理好公益性与盈利性的关系，

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赢，成

为摆在交通运输部和铁路总公司面

前亟待破题的一道坎。

常言道“知易行难”，防止“经营自主权”异化为涨价特权，必须恪守以人为本的经营理念，切实转换经营模式，努力提升管理效率，以全新的机制与思路，克服与生俱来的“国企病”；要鼓励多方融资，尤其要欢迎民间资本投入铁路领域，运营主体多元化，市场竞争充分化，才能以机制活力倒逼权力自律；要尊重民意，体恤民情，确保民众对价格形成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还公益于普通百姓，为国民打造安全便利的绿色出行环境。

我国地域辽阔，经济发展不平衡

是国情，人民生活由温饱向小康过渡

是现实，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

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升级，市场容量

进一步扩大是发展的巨大动力和潜

力。通过一系列分析表明，对我国这

样一个发展中大国来说，拉动经济增

长的最主要力量仍然是国内需求，这

是经济发展的坚实基础。所以，国家

在这千载难逢的发展时机应发挥好

指导作用，科学引导供求关系，将对

拉动内需、经济发展起到实质作用。

（作者系宏达集团董事局主席）

刘沧龙

中央已经明确提出要坚定不移地把扩大内需作为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方针，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近年来，国务院为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具体确定了多项措施，但要真正扩大内需让老百姓受益，国家可以从鼓励创业、指导促进“三农”建设方面着手，这将对扩大内需起到实质支撑作用。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

立，我国的创业活动日趋活跃，创业环境正在不断改善。中小企业的单位投资容纳的劳动力和单位投资新增加的劳动力都明显增加，在就业弹性不断下降的背景下，实行“以创业促就业”的积极就业政策，大力开展创业活动，促进新企业的产生，是解决我国就业问题的根本途径。创业带动就业不仅仅解决就业问题，更重要的是促进了投资和消费，进而拉动内需。清华大学中国创业研究中心的报告指出，2002—2012年是我国最好

研究

“最幸福政府”最应减速税收

13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在为政府打工

彭飞

国税总局1月16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全国税收收入完成11.07万亿元（不包括关税和船舶吨税，未扣减出口退税），比2011年增长11.2%，增收1.12万亿元。财政部此前发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前11个月，全国税收收入累计达9.36万亿元，较2011年同期增长9.8%。将全年税收收入与前11个月的数据相减，我们不难得出，2012年12月，全国税收收入当月新增1.71万亿元，较上年同期的4503亿元大幅增长280%，创下史上单月最高。相比之下，在去年前11个月，当月同比数据平均下来不过10%。如何解释这如此匪夷所思的数据？难道12月份的经济增长突然发生了井喷？当然不是。

倘若国税总局公布的数据准确，这意味着，为达到全年税收增长目标，中国政府去年底突然大幅提高征税力度，造成当月税收收入激增——如此随意的突击增税，对中国企业与中国经济来说，这绝非幸事。

数据显示，2000年至今，中国的税收增长率持续高于GDP增长率。在过去13年中，GDP平均年增长10%，税收年均增长近20%，相差近一倍。2000年到2012年，GDP在13年间翻了5.24倍，而税收增长却翻了8.74倍。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在为政府打工。

中国政府需要推进预算改革以及更深层次的政府改革，只有解决了最核心的征税权力来源与社会监督问题，中国的税收增长才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而非像现在这般，政府税收增长“按下葫芦浮起瓢”——在经济减速期间，各级政府反而加大了盘剥力度，表现为非税收入大幅增长。对于一个权力不受限制的政府来说，“竭泽而渔”将对整个宏观经济造成难以估量的伤害。

从税收的角度看，中国的政府堪称是“全世界最幸福的政府”，因为要征多少税完全由自己说了算，“人大”甩手不管，每年所谓的“预算”几乎起不到监督作用，否则何以解释过去的十几年持续高增长的税收增幅，以至于超过经济增速整整一倍之多（去年算是“客气”的，税收“仅仅”增长了11.2%，但还是高出GDP增速3.4个百分点），同时也大幅超过预算收入。

前不久财政部表示要坚决防止征收“过头税”，但上述这种超高增速，是最明显的“过头税”吗？税务部门可以也许又会解释说，从总体来看，中国的税负还是不高的。果真如此，则至少证明早先所设计的税制大有问题，以至于造成过去十几年持续高增长的税收增幅，以至于超过经济增速整整一倍之多（去年算是“客气”的，税收“仅仅”增长了11.2%，但还是高出GDP增速3.4个百分点），同时也大幅超过预算收入。

前不久财政部表示要坚决防止征收“过头税”，但上述这种超高增速，是最明显的“过头税”吗？税务部门可以也许又会解释说，从总体来看，中国的税负还是不高的。果真如此，则至少证明早先所设计的税制大有问题，以至于造成过去十几年持续高增长的税收增幅，以至于超过经济增速整整一倍之多（去年算是“客气”的，税收“仅仅”增长了11.2%，但还是高出GDP增速3.4个百分点），同时也大幅超过预算收入。

企业如何做好新产业工人的培训

具有新一代农民工属性的企业员工应着力提升综合就业能力

吴荣嘉

随着城市化、国际化、信息化的加速推进，数以亿计的农民工进城务工。随着时代的发展，老一代农民工解甲归田，八十年代以后出生的新一代农民工登上历史舞台，他们被称作“新生代农民工”。相关数据显示，目前，全国约1亿名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是农民工的主体。大量新生代农民工转移到城市生活、就业，一方面为城市经济发展、建设提供了必要的劳动力，他们的技术水平成为城市建设、经济腾飞的关键，但是无论在受教育程度和整体素质上来看，他们与城市人口相比还是存在一定的差距。

第一代农民工只要肯出力，能吃苦就能生存，而新生代农民工对职业的期望值较高，面临过剩经济时代的产业结构调整的复杂局面，他们不仅要和第一代农民工竞争岗位，还要与庞大的大学生群体来竞争岗位。在这种情况下，专业知识和职业技能的培训对新生代农民工来说尤为重要。

根据大连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调查，75%的新生代农民工都有高中及以上教育经历，为了提高职场竞争能力，90%的新生代农民工都利用周末进行“快餐式”培训，但大多数培训只是为了短期的工作应急，缺乏系统性、持续性。大多数具有新生代农民工属性的企业员工，继续学习的愿望非常强烈，70%的人表示迫切需要快速、全面的提高专业技能知识。

由于闲暇时间较少、下班时间较晚、在大城市交通不便、学习培训机构距离较远等众多因素，导致便捷、有效的专业培训无法普及。更加合理的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体系的建立，应该结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及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加强职业技能培训的计划性、针对性、创新性。远程教育的教学理念主要体现在开放性上，培训者与教育组织之间主要采取多媒体手段进行系统教学和通讯联系的教育形式，恰好能够弥补传统培训时间和空间方面限制。

设有远程教育系统的综合性职业培训基地能够将培训和就业结合起来，建立兼有职业培训、技能鉴定和职业指导等功能，教学中心通过远程教育服务平台，新生代农民工可自行通过计算机按培训要求学习，并及时接受辅导、释惑解难。他们既可以集中上课，系统学习，也可在工余时间利用网络自主学习。对于实践性要求较高的专业，还可以实行校企联合，将远程培训和实际操作结合，增强学员的实践能力。

远程教育的特点决定了远程学习的过程中，自发的学习动力和宽泛的学习领域非常重要，因此，设有远程教育系统的综合性职业培训基地应满足农民工思想政治教育、时势政策、法律法规、休闲娱乐等需求，着力提升农民工的道德水平、精神境界和综合就业能力、创新能力。

刘沧龙

扩大内需：从分级税制鼓励创业做起

刘沧龙

中央已经明确提出要坚定不移地把扩大内需作为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方针，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近年来，国务院为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具体确定了多项措施，但要真正扩大内需让老百姓受益，国家可以从鼓励创业、指导促进“三农”建设方面着手，这将对扩大内需起到实质支撑作用。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

立，我国的创业活动日趋活跃，创业环境正在不断改善。中小企业的单位投资容纳的劳动力和单位投资新增加的劳动力都明显增加，在就业弹性不断下降的背景下，实行“以创业促就业”的积极就业政策，大力开展创业活动，促进新企业的产生，是解决我国就业问题的根本途径。创业带动就业不仅仅解决就业问题，更重要的是促进了投资和消费，进而拉动内需。国家在面对不同创业形式时，可尝试实行分级税收制度。比如对投资一百万以下的企业实行免税，若投资110万创办企业，分级缴税就只缴10万部分的税。这样将有大量人员自主创业，创业、就业、扩内需、经济发展将形成一条良性的循环发展路线。

（作者系宏达集团董事局主席）